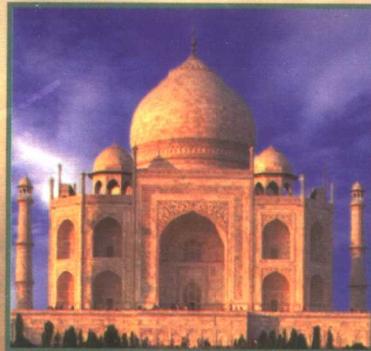


周秦汉唐研究书系

唐代丝绸之路 与 中亚历史地理研究

许序雅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浙江省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

唐代丝绸之路 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

许序雅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许序雅著 .—西
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5

ISBN 7-5604-1470-2

I . 唐… II . 许… III . ①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唐
代②历史地理-研究-中亚 IV . K928.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805 号

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

许序雅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校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302590)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开本 8.375 印张 21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604-1470-2/K·197 定价:16.00 元

2001.3.26

王府井书店

No. 0199093

提 要

自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到代宗大历七年（772年），中亚诸胡与唐朝发生了长达149年的直接交往，丝绸之路成为双方政治、经济和军事交往的纽带。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政治势力第一次越过葱岭，在河中、吐火罗等地设置了羁縻州府，中亚诸胡与唐朝建立起近百年的政治附属关系。唐朝与中亚交往的历史，构成了唐代内容丰富的历史篇章。

有关7~8世纪中亚诸胡的历史变迁，中亚诸胡与唐朝的交往之记载，主要保存在《大唐西域记》、《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西域传》和《册府元龟》等唐代文献中。这些文献还反映了唐人对中亚诸胡的认识。本书即以这四篇文献为中心，兼及唐代其它相关文献，围绕“唐朝与中亚”这个重大课题，探讨唐代丝绸之路的变化，中亚诸城的方位和道里，7~8世纪中亚诸胡的政治发展，中亚诸胡与唐朝政治关系的演变，中亚诸胡、唐朝和大食之间的政治关系，唐朝在中亚诸胡抗击大食斗争中的作用，唐人对中亚诸胡的了解程度，汉籍记述的可信度。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力求以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中亚考古资料与唐代文献记载相参对，并对前人研究成果加以辨析。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1998年11月通过答辩）基础上修改而成，被列为浙江省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本书是对唐代文

献相关记载的系统研究，这在学术界是第一次。全书 17 万字，分为四章，每章论题各有侧重，各以一篇唐代文献（《大唐西域记》、《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西域传》和《册府元龟》）为中心。第一章 7 世纪的中西交通；第二章 8~10 世纪中西陆路交通；第三章《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史地考辨；第四章中亚与唐朝的交往。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作者发现唐人所记千泉、白水城、恭御城、笯赤建城、米国都城的方向有疑问，不能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相勘合；唐人把曹国（西曹）与东曹（苏对沙那）相混淆；唐人对中亚伊斯兰化进程并不了解；唐人所记中亚诸城道里有许多讹误；8 世纪后期开始，随着西域东部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化，丝绸之路（中国段）走向发生变化，唐人西去东归之路与中亚诸胡东来之路有所不同；中亚诸胡与唐朝关系有亲疏之分；中亚诸胡的入唐贡献，并不是“以献为名”的商业活动，而主要是政治性的活动，这种朝贡活动反映了中亚诸胡与唐朝政治关系的演变；在中亚地区，唐朝确有支持中亚诸胡抗击大食的战略，唐朝与大食的关系尚不能定性为同盟友好关系。作者提出的上述观点，对以往中外学者（如法国学者沙畹，北京大学王小甫）的许多论点有很大的修正。本书的出版，对于唐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唐代文献研究、中亚学研究都将是很大的推进。

Studies on Tang's Silk Road and Central Asia's History and Geography

Abstract

From 624 AD up to 727 AD, the states of Central Asia had a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Tang Dynasty for as long as 149 years. The Silk Road became a link for the two sides to communicate in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Tang's political power, for the first time, spread farther than Chong—Ling, setting up an indirect dominating system in such lands as Transoxania and Tokharestan. It created a kind of political dependency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Tang.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ang and Central Asia constitutes a rich history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states of Central Asia in the 7th—8th centuries and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Tang are mainly kept in *Da Tang Xi Yu Ji* (Records of the Western Lands of the Great Tang Period)(《大唐西域记》), *Xin Tang Shu · Di Li Zhi*(《新唐书·地理志》), *Xin Tang Shu · Xi Yu Zhuan*(《新唐书·西域传》), *Ce Fu Yuan Gui* (《册府元龟》) and other Tang's lit-

erature, which also reflected Tang people's knowledge about the states of Central Asia. This book, having these four books as its leading reference, centralizes on the important topic—"the Tang Dynasty with Central Asia", which probes the changes in the Silk Road during Tang, the location of the states of Central Asia and their construction sites, the political growth of Central Asia in 7th—8th centurie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Tang,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tates in Central Asia, Tarig and Da shi (Arab), the Tang playing role in the struggle of Central Asia against Arab, how far Tang people knew about Central Asia, and how much belief could be borne in the Tang literature. As far a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concerned, this article tries to verify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Islamic geography, the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the Tang literature. It also attempts an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work done by other scholars.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four chapters. Each chapter has its own focus, concerning one Tang's book. Through an all-round research into the records in the Tang literature, the author finds out that the recorded locations of Qianquan(千泉)、Baishui city(白水城)、Gong Yu city(恭御城)、Nuchijian city(赤建城) and Miguo city(米国都城) couldn't be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records of Islamic literature(Abarjaj, Isfijab, Nujakath, Māymurgh). Tang's people confused Cao(西曹, West Cao) with East Cao(东曹). They didn't quite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Islamic of Central Asia. There are a lot of errors made in Tang's records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s of the states in Central Asia. Since the late 8th century, with the change of th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in the east of Western Lands, the trend of the Silk Road in Chinese territory altered. The Chinese and

Central Asian didn't follow exactly the same route. The states of Central Asia did not bear a same kind of close relation with Tang. The presentation of tribute of Central Asia paid to Tang is in a political activity rather than a commercial one, reflec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ange in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Tang. In Central Asia, Tang did back the states of Central Asia in their struggle against Arab.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and Arab can't be defined as a good allied one.



许序雅，男，1958年2月出生于浙江省武义县。1979年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1983年考入贵州师大历史系，从项英杰师学习中亚史，获硕士学位；1995年考入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历史系，从黄时鉴师，攻读中西关系史博士学位。1985、1999年两次赴丝绸之路考察。发表论文30余篇，专著1部，译著3部（与人合作）。

许序雅
1999年

目 录

导 言.....	(1)
一、研究现状.....	(1)
二、问题的提出	(11)
三、研究方法及基本概念	(14)
四、各章研究的基本问题及贡献	(18)

第一章 7世纪的中西交通

——《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行程辨析	(25)
一、玄奘所记路线和里程	(25)
二、诸城方位	(29)
1. 关于碎叶	(29)
2. 关于千泉	(31)
3. 关于恭御城	(33)
4. 关于笯赤建城	(35)
三、玄奘行程考辨	(38)

第二章 8~10世纪中西陆路交通

——《新唐书·地理志》考辨.....	(53)
一、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之记述	(53)
二、贾耽《皇华四达记》之记述	(58)

三、其它汉籍所记西行道路	(63)
第三章 《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史地考辨	(77)
一、康国	(77)
1. 关于《新唐书·康国传》反映的年代及 康国的宗教信仰	(78)
2. 关于康居都督府设置的年代	(80)
3. 关于康国至周邻国家道里	(81)
二、安国	(83)
1. 安国的历史变迁	(83)
2. 关于安国诸王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86)
3. 关于安国的道里	(88)
三、东安	(89)
四、东曹、西曹、中曹	(92)
1. 关于曹国的政治状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93)
2. 关于曹、东曹、西曹的区别	(95)
3. 关于东曹、西曹的道里	(98)
五、石国	(99)
1. 几个名称的考释	(100)
2. 关于大宛都督府设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101)
3. 关于石国诸王	(104)
4. 关于石国道里、四至	(109)
六、米国	(112)
1. 关于米国、东米国的方位	(112)
2. 米国的政治状况	(116)
七、何国	(120)
八、史国	(123)
九、火寻	(127)
十、宁远	(128)

1. 关于拔汗那、呼闷城、西鞬城、渴塞城、俱战提	(128)
2. 拔汗那的政治状况	(133)
3. 拔汗那与唐朝的交往	(135)
4. 拔汗那的四至	(139)
十一、关于汉籍记述的史源	(142)
第四章 中亚与唐朝的交往	
——以《册府元龟》为中心	(169)
一、中亚诸胡朝贡与唐朝册封之统计	(169)
二、朝贡频率与西域的政治形势	(190)
三、朝贡、贡使、贡品及其政治、经济意义	(208)
1. 关于朝贡	(208)
2. 关于中亚诸胡的遣使	(211)
3. 关于贡品	(215)
主要参考文献	(239)
后记	(251)

导　　言

1985年8月，我徘徊在丝绸之路（中国境内）考察之行的终点伊犁河畔，举目西望，试图追溯玄奘的足迹，回到唐代的中亚……

一、研究现状

唐代，在以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为中心的中亚地区，主要生栖着被中国史籍记之为“昭武九姓胡”的康、安等国和拔汗那。从武德七年（624）到大历七年（772），中亚诸国与唐朝发生了长达149年的交往。在吐蕃、东西突厥、突骑施前后雄起，大食不断东扩，东西文明不断交流的历史大背景中，在传统的丝绸之路上，金戈铁马之声不绝于耳，中亚诸胡使者、商人以及唐朝使者、僧人相继于道，成为中亚与唐朝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唐代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岁月里，唐朝政治势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越过葱岭，在河中、吐火罗等地设置了羁縻州府；中亚诸胡与唐朝确立起政治附属关系，并企图依赖唐朝抗击大食；西域文明对唐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乃至社会生活发生了

深刻的影响。

面对内容如此丰富的、色彩如此斑斓的历史篇章，众多学者不禁深深为之吸引，写出了许多与“唐朝与中亚”课题相关的传世之作。学术界关于“唐朝与中亚”和中亚学方面研究成果的积累，已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可贵的基础。这些成果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1. 有关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方面的成果

法国学者沙畹 (E.Chavannes)《西突厥史料》(1903)，系统整理、翻译了两《唐书》及《册府元龟》有关西突厥的史料，并对上述汉籍中所涉及的中亚地名、相关史实做了简单考释。本书高明之处在于，作者注意以伊斯兰舆地文献来考辨汉籍所记。由于本书论述重点是西突厥史以及唐朝与西突厥的关系，所以作者没有利用中外文献来系统研究“唐朝与中亚”这一课题。作者尽管摘录了《册府元龟》有关中亚诸胡入唐朝贡的部分记述，但并没有展开研究，且对中亚九姓胡的朝贡性质定性不准。

英国学者米诺尔斯基 (V.Minorsky) 在翻译《世界境域志》(Hudūd al- ‘Alam, London, 1937) 时，以其良好的语言修养，大量使用伊斯兰文献，对 8~10 世纪中亚历史地理做了详细考释。我们在确定中亚众多地名的确切地点时，往往要借助他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他没有涉及汉籍记述。

荷兰学者德·胡耶 (M.J.de Goeje) 系统整理了古典时期 (8~10 世纪) 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编成《阿拉伯舆地丛书》8 卷 (Leiden, 1870~1894)。在本世纪，一批法国学者又重新译校了这些舆地文献^[1]。我国学者宋岘也翻译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1991)。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 7~10 世纪的中亚历史地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英国学者亨利·玉尔 (H.Yule) 收罗、节译了一批伊斯兰舆地文献，并做了初步的研究工作，写成《契丹行程》(London,

1913—15)。中国学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有许多资料译自玉尔的书。

1933年，在中亚撒马尔罕以东约140公里的穆格山城堡陆续发现了约90件文书，大部分是粟特文书，也有汉文、阿拉伯文和古突厥卢尼文书。穆格山文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使我们能够不再局限于从外部，即从汉人、阿拉伯人或突厥人的记述来研究粟特史，而可以从粟特人内部来观察历史。经学者们整理、释读和研究，确认这批文书主要是喷赤干领主迪瓦什梯奇的档案。围绕着文书的定年、文书所记人名、地名的考释、迪瓦什梯奇的身份及其统治年代、迪瓦什梯奇与康国王突昏、乌勒伽的关系、迪瓦什梯奇何时称粟特王、8世纪初粟特地区的政治状况诸问题，苏联学者克拉契柯夫斯基夫妇(В.А.И.Ю.Крачковские)、弗列依曼(А.А.Фрейман)、里夫什茨(В.А.Лившиц)、斯米尔诺瓦(О.И.Смирнова)、克里亚什托尔内(С.Г.Кляшторный)、美国学者费赖(R.N.Frye)、日本学者岩佐精一郎展开了长期的讨论。中国学者马小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汉籍记述，考定喷赤干即米国都城钵息德城，迪瓦什梯奇就是开元六年(718)遣使来朝的米国王。他还对穆格山粟特文书所反映的公元8世纪初期的粟特政治状况作了详尽的研究^[2]。

中国学者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1915)，对《唐书》、《大唐西域记》所记西域史地做了考证，有筚路褴缕之功。但是，丁谦忽视了汉籍有关西域史地记载因袭抄补的情况，以汉籍互校的方法来考辨西域史地，有“以讹校误”之嫌。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编注了大量中外文史料，并对西域史地的相关记述做了部分考释。其书与唐代有关的部分主要在第四册，论题主要有“唐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唐

代在中国之中亚人及其后裔”，“唐人所记中亚之动植物”，“唐代西域人组成之军队考”。该书主要缺陷在于，外文史料出处不明或混乱，审音勘同不甚了了，没有把中外文献结合起来研究，也没有考辨汉籍所记是否正确。对该书缺陷，冯承钧先生有专门论述^[3]。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把沙畹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对西突厥史以及西突厥与唐朝的关系史提出了系统的见解。他还考证了公元588年西征波斯的突厥可汗，“昭武”的对音，唐朝所置西域十六国都督府州治地。由于选题所限，作者并没有涉及西突厥在中亚诸国的活动情况，以及突厥人在唐朝的中亚防御战略中的作用等问题。

长期以来，《大唐西域记》以记载详实、可靠而为中外学者所称道。对该书的整理、研究，历来为中外学者所注重。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984)、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1989)，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全译》(1995)堪称“《大唐西域记》研究”的代表作。四书各有所长，但在中亚地名勘同方面，尤以季书为善。季羨林等融汇各国学者研究成果，充分利用了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及中亚当地的考古成果，对《大唐西域记》所记各地的历史、地理、物产及文物制度逐地做了详细考释。他们的研究，代表了当今中外学者研究《大唐西域记》的最高成就。但是，他们没有把玄奘的中亚行程在整体上加以考辨，致使他们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失误和空白，诸如：玄奘所记中亚行程是否有误；千泉、笯赤建、白水城、曹国、米国等地究竟地处何方。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明了唐初丝绸之路中亚段的走向，不可能真正确定《大唐西域记》的可信度。正因为十分确信玄奘所记道里的正确，周连宽的研究才会漏洞颇多。他把碎叶、千泉、白水城、笯赤建、石国都城审勘异地，以求证玄奘所记之正

确。

国外学者研究《大唐西域记》的代表作应是 T. 瓦特斯 (Thomas Watterson) 的《大唐西域记》英译本 (1904)^[4]。瓦特斯注意到玄奘所记中亚道里有所错乱，白水城、千泉的地点有疑问。但是，他没有系统利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来验证玄奘所记，也没有把玄奘的中亚行程从全程上加以考辨，致使发现玄奘之记有误的机遇失之交臂。

对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研究，重要的成果有韩国学者梁翰承、冉云华的校释本（伯克利、汉城，1984）^[5]，日本学者桑山正进的《慧超往五天竺国研究》（京都，1992），以及中国学者张毅的《往五天竺国传笺释》（1994）。桑山正进的研究分为释文、译文、译注三部分，并有附论、参考文献、索引，其研究较为深入。张毅主要依据汉籍记述，对中亚的安、曹、史、米、康、跋贺那（拔汗那）等国史地做了粗略考辨。

苏联学者克利亚什托尔内（С. Г. Кляшторный）在《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1964。中译本，1991）中，分析了汉籍史料与突厥鲁尼文碑铭，大大推进了6~8世纪中亚史地及突厥人与唐朝关系史之研究。此书尤为令人注意的一个贡献是，作者考定《毗伽可汗碑》（大铭文第24~25行）和《阙特勤碑》（大铭文第31~33行）所记默啜在公元701年前后征讨的 alty Čub Soýdaq，并不是如马迦特（J. Marquart）所说的“粟特昭武六部”，而是唐朝的六胡州；Čub 为汉语“州”的对音，而不是“昭武”的对音^[6]。中国学者张广达也接受了此观点，并加以考辨^[7]。

2. 有关唐代西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

俄国学者巴托尔德（V. Barthold）在充分挖掘、整理和利用阿拉伯—伊斯兰史料的基础上，著《七河史》（1893）、《迄至蒙古入侵的突厥斯坦》（1900）^[8]，《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7），拨去了7~12世纪中亚历史上的厚重迷雾。他对中亚诸城（如怛